

《红岩》76正芳华

【编者按】

一位哲人曾经这样说过：文学是人的生活的教科书。作为重庆唯一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，《红岩》是许许多多文学追求者精神生活中的一盏灯。

今年，是《红岩》杂志创刊70周年。70年来，她培养了大批作家，发表了大量佳作，创造了辉煌，成为了我们这座城市颇具地域特色的文化名片。如今，历经岁月的风雨，《红岩》深沉内敛又充满朝气，淡定从容又生机盎然，坚守阵地又锐意创新。

祝愿70岁的《红岩》，芳华永驻！



联袂书写的历史精彩

□凌承伟

上个世纪70年代末，重庆市文联恢复工作，《红岩》文学杂志旋即复刊。

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，重庆文联业务工作的重心是办好《红岩》杂志这份当时西南地区唯一的一份大型文学期刊。其时，《红岩》杂志实行双主编制，资深编辑家马戎任主编，重庆市文联党组书记王党兼任杂志第一主编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重庆文联的工作活跃、繁忙，一派新气象。我作为《红岩》杂志复刊后的美术编辑，同时兼任文联的美术工作，经历、见证了这段时期文联不少有意义的事。

1979年初，《红岩》杂志复刊后的第一期发表了况浩文的中篇小说《茫茫的夜色后面》（原名《一双绣花鞋》），印数达13万册，在重庆社会和文坛上激起不小的涟漪。

随即，第二期将发表周克芹的长篇小说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》（以下简称《许文》）。王党和马戎找到我说，《许文》是一部难得的好作品，可否请一位画家配画几幅



热情的读者在解放碑新华书店门前排起了长龙，购买复刊后的第二期《红岩》杂志。凌承伟 摄

好一点的插图。

于是，我想到了四川美术学院的白德松老师。几年前，他创作的连环画《西双版纳的故事》在全国美术展览上受到一致好评。他的人物造型能力以及笔下人物的生动性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

记得当时杂志发稿时限已经临近。《许文》的作者周克芹正住在重庆文联办公楼上临时隔出的一间客房中，夜以继日地修改文稿。他修改好一部分，便交一部分给我，送到四川美术学院白老师处。

白老师后来告诉我，他是读完《许文》27万字全部文稿后，统一构思绘制插图的。大约一周后，插图完成，我如约去取。他一边把插图交给我，一边感慨地对我说：“很多年没有读过这么好的小说了，如果有机会，我很想认识这位作者。”

白老师是在八开大的水彩纸上用水墨画形式绘制的这套插图，共计6张。显然，插图的创作不是对小说中的人和事作简单图解，而是基于深切感动之上的再创作。

图文并茂，相得益彰！杂志的几位主编、副主编对白老师创作的插图均甚为满意，尽管该期杂志版面很紧，仍然一致同意用16开整幅页面刊登插图，每个页面一幅图。

记得王党特别叮嘱我，插图稿费要高一点，可以突破规定，并明确说每幅10元。这对当时《红岩》杂志的稿费规定来说是破格了。

周克芹得知此事后，特地来到我的办公室，十分认真地看了每一幅插图后，欣慰地对我说：“谢谢你，谢谢白老师了！他画的许茂老汉和四姑娘正是我写这部小说时心目中的物象，白老师与我真是心有灵犀啊！”

我向周克芹传达了白老师对《许文》的赞赏和对他的敬意，他双手再次捧起插图说道：“我也很想认识白老师，请转告他，这次是没有时间了，下次我来重庆时一定专程到四川美院拜望他！”

12月初，第二期《红岩》杂志出版发行，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》在文坛上和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。

记得出刊那天，我有事到解放碑，正好见到新华书店在卖第二期《红岩》杂志。热情的读者在书店门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，以至于书店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出来维持秩序，限定每人最多只能买两本。

在书店柜台前涌动的人群中，我忽然看见王党那光亮的额头。他正站在排队买书的人群旁边，一边帮助工作人员维持秩序，一边春风得意地与一位好像是书店的负责人交谈。他看见了我，便赶忙走过来对我说：“你能不能找架相机，把这个场面拍下来！”压低了的声音抑制不住他内心的喜悦。

于是，我到附近的市美术公司一位朋友处借来相机，对着卖书的柜台和排队的人群连拍了几张照片。殊不知，这些照片日后竟成了见证《红岩》杂志一段历史辉煌的珍贵史料了。

第二期《红岩》杂志脱销后又加印了两次，最后统计共印了18万余册。这在当时是非常大的发行量了。

1982年，中国作家协会把当代中国文学最高奖励——首届茅盾文学奖，授给长篇小说《许茂和他的女儿们》。年底，周克芹赴京领奖，《红岩》杂志责任编辑熊小凡应邀出席颁奖大会。

光阴荏苒，40年过去。《许文》作者周克芹和原《红岩》杂志主编王党、马戎，以及责任编辑熊小凡等人都已作古，小说插图作者白德松也已两鬓染霜，这位四川美院的资深教授退休后退居成都，依然笔耕不已。

作为时任《红岩》的美术编辑，我至今仍为两件事感到遗憾：

其一，周克芹和白德松，两位曾经合作、相互仰慕的作家画家，因为周克芹的过早去世而未能如愿以偿，谋面握手。

其二，囿于上个世纪70年代印刷技术落后以及杂志用纸质量不高，《红岩》杂志刊登的《许文》插图显得模糊不清，效果与原画相差甚远，致使读者未能真正领略到优秀插图对于优秀小说的意义所在。

1998年，《红岩》杂志复刊100期之际，我在封面上重新用整版篇幅刊发了《许文》插图中的四姑娘一图，算是弥补了一点历史的遗憾。

岁月匆匆，《红岩》杂志自1951年创刊迄今已经70年，1979年复刊到现在也有40余年。每当我打开所藏已经发黄的杂志，面对曾经熟悉且经手过的文学和插图作品，一些如烟往事便又萦回脑海。

作为复刊后的第一任美术编辑，我要对曾经支持和关心过《红岩》杂志的美术家们致以深深的谢意，向推动重庆文化艺术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几代优秀作家、艺术家表示深深的敬意。

其时我刚刚大病初愈，正闲得无事，便一口答应下来，做了一些我认为该做的事情。

有关首届“红岩文学奖”的评奖结果后来在媒体上有正式发布，此处也不再赘述。其实我对首届红岩文学奖最深的印象跟蓝锡麟和王本朝是一致的，那就是我在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一段话：“此次评奖，体现了客观性、公正性和权威性，像这样的评奖机制，在重庆的文学艺术评奖活动中，尚属首次。”

此后，红岩文学奖每两年举办一次，我也一直参加到2018年的第六届。我相信它对提升重庆文学的影响力，促进重庆文学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。

2009年《红岩·重庆评论》创刊，是我记忆中《红岩》这10年来所做的跟文学评论有关的更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它不仅为重庆文学界提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评论刊物，解决了重庆文学界一直没有专业评论平台的问题，而且《红岩·重庆评论》跟作为文学创作刊物的《红岩》出自一家，形成一种难得的创作和评论两轮驱动的文化传播格局。

如今，《红岩·重庆评论》已经走过整整10年了。我一方面对这份特殊刊物的生长感到欣慰，一方面也有些许遗憾。《红岩·重庆评论》在这10年里为活跃重庆文学评论无疑作出了独特的贡献。但整整10年了，重庆文学界仍然没有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产生一份类似湖北《长江文艺评论》那样的真正的文学评论刊物。

不过《红岩》已经把重庆的文学评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。

重庆文学界应该对《红岩》这10年的努力充满敬意和感激，我们也有理由对《红岩》下一个10年充满期待。

□刘阳

我的籍贯是重庆，生于渝中母城。

在中学时代我开始偏爱文学，助推的力量得益于书法。这两样东西从那时起就一直伴随我，成为我生活的部分，一直到现在。所以我的内心生活一直有一种我独享的幸福，持续绵长的幸福，后来我的职业与此相关，一生与文学艺术相关，我是幸福上叠加幸福的人。

我大学毕业后就基本居于渝中。除了外出出差，大部分时间住在城里，我叫固守。几十年下来，我生活工作的地方，也是我出生的地方，巴掌大，邮票大，天天用步幅丈量，具有浓重的宿命色彩。这种浓重，随岁月弥加重。

重庆是一座英雄城市！我认为这是重庆的标签，更是重庆的王牌。我一直以此为傲。

它的气质，它的魂魄，就是英勇顽强，富有丰富的精神力量。

这种英勇顽强更倾向于坚韧，内力强大，可以千疮百孔地存在，可以壮丽辉煌地存在，可以如山，可以如水，取大气象也不拒人细小而刚柔相生。立体而包容，有精神取向，具大格局。

生活在重庆，原来是要赋予我这样的生活——我的生活！

如是，几十年人生，最值得我庆幸，最值得我细数，或者我骄傲一点，最值得炫耀，最值得满足的，想来想去，现在我能得出的最终结果就一个，即是我拥有一个精神家园。就这一个，别无其他，或者说其他远不及她。这个精神家园就是一本杂志——《红岩》。

精神是我生活中弥足珍贵的求索指标，而《红岩》极具重庆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象，我投身其中，是我的职业选择，我的兴趣选择，更是我的志向选择。

值《红岩》70华诞之际，别有感慨。万千感慨，归于一言：重庆是我的母校，《红岩》是我的魂！这是我最新的发现，最新的认定。或者，《红岩》是我灵魂上一枚铃印，鲜红的，永不消退的铃印。

《红岩》70年中，我系于《红岩》30年。这天地间的缘分，在岁月长河的起承转合中，怎么就降临到我的头上。从投身《红岩》那一刻，我明白我找到了。我要什么，就那一刻我一下全明白。这30年，《红

□强爨

工作以后，我开始写小说，和一些朋友谈到投稿，也不知谁说，“先给《红岩》投稿吧。本地的刊物，会容易一点。”但其实，一点都不容易。

我们按图索骥写给主编的信，一直都没有回音。这更加深了我和朋友们对《红岩》清高的印象。那时红岩杂志社的地址我们已经背得烂熟，就在两路口中山三路来庆龄故居旁边，两路口是个交通中转站，我们经常在那里换车。我们明明看见了院子里面有那个灰色的大楼，琢磨着《红岩》就在那里生产，但就是不敢进去。

那些年，我才20几岁，迷惘、彷徨、欣喜、不甘，像黄葛树上的一茬接一茬的新叶，混着雨水、尘土，要一吐为快。

2005年，我在一家都市报工作。有一天下午，我正在办公室坐着，突然于空旷中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，然后迎面走来了一小队人。

时任红岩杂志社主编刘阳、副主编欧阳斌望着我。“你是强爨？”刘阳问。

“是的。”我吓呆了。

“我是来看看你的作者的。”刘阳转头说，她旁边还站着报社总编，办公室几个中层干部陪同在后。

刘阳跟大伙介绍，《红岩》刚发表了我的一个中篇小说，“写得不错。对了，她还在其他外地刊物也发表过。”我战战兢兢地坐下，没想到第一次见面在这样的场合。

但与此同时，我也轻松了，过去觉得《红岩》杂志那种缥缈天上云的感觉，仿佛被风吹走了。

后来，刘阳主编约我去办公室坐坐，我才走进了两路口那栋灰色大楼。主编办公室里有一架宽厚的大黑沙发，我坐下后，刘阳、欧阳斌就在我对面推盏喝茶、吞云吐雾起来。房间里积压着各种刊物、书报，黄色的窗帘拉上一半，灼热光线变成了玫瑰金色。他们问我的创作情况、生活状况，我小心翼翼地回答。两个主编都很健谈，聊到了《红岩》对新人的追踪和寻找，谈到重庆文学的生态、建设。

其实那是个十分文学化、电影化的场面。那个下午，我甚至有一种新人琼·芳登在好莱坞试镜《蝴

与之同在

《红岩》支撑我，指引我，充实，无惧，甘之如飴。其间的甘苦，让我未感时间的漫长，反到觉得岁月如梭。生命的选择幸运之最为幸运，选择《红岩》，从此生命得以附丽。

那时，期刊极不景气，《红岩》也不景气，我好像全然无惧。人往高处走，我觉得我并未走低。《红岩》是一面旗帜，我愿做擎旗手。什么不景气，那分明是我人生的高光，人生途中选择的高光。那时我年轻，那时我一定是充满光亮的，神采光亮，灵魂光亮，浑身光亮。在《红岩》30年，是我宝贵的生命历程，风雨雷电荆棘坎坷，方向从未改变。内心方向在，我自坚定从容。

《红岩》塑造我，成全我。我之为我，自有我在，我与《红岩》同在。《红岩》是时代产物，与时代共荣辱。她是时代发展的一个文学版本，也是我与之30年的一个版本。30年来，我最为感佩的，是《红岩》大气稳重，无计宠辱，不弄潮流。所以我要求自己，勇往直前，无畏无惧；不给《红岩》抹黑，只给《红岩》涂金。

在《红岩》60华诞的时候，我总结前辈编辑留下的传统：“编辑远离鲜花掌声，从未停止播种耕耘。”今天，在《红岩》70华诞之际，我想把时常告诫自己的话，再告白一次：“编辑系为人作嫁的主，非成名得利的角儿。”以此对《红岩》作一表白，寻常而郑重的表白。

其实这句话是30年《红岩》予我的启示，领悟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30年的过程。好在我领悟到了。我领悟到了。如此契合我的天性我的心性，不以名利衡量前程，更为金钱奴役心智，所以《红岩》给予了我一个无比宽阔的空间。

置身这个空间，生命之树可任由在岩崖上挺拔，精神之光方超拔世俗而焕发异彩。滚滚红尘，过眼浮华，人到最后没有什么割舍不下，而最要害的，是人的心灵，人的精神。所以除了工作和生活，我最需要的是飞翔。精神飞翔起来，心飞翔起来，我就飞翔起来。飞翔于至高，则可俯瞰人生，俯瞰苍茫，绝少被周遭乱象迷惑而放言，《红岩》恰似我飞翔的翅膀。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。

还有什么比这更好——这么说吧，《红岩》，对你的情感，永不消退。这么说吧，《红岩》，对你的感恩，刻骨铭心。与之同在，我心不变。

与之同在，与《红岩》同在，永在。

我与《红岩》共成长

蝶梦》的幻觉。这部希区柯克的经典影片，混合着爱情与悬疑的味道，琼·芳登的紧张、不安、期待和雀跃，那一刻在我身上全降临了。连《蝴蝶梦》中那些雾气迷蒙、潮湿混沌的日子，也和眼前玫瑰金的空气何其相似。

2006年，《红岩》以新锐之名重点推出了我的两个小说、一篇创作谈、一个对话。那时是欧阳斌副主编亲自与我对话，我紧张得生怕说错了什么。这期栏目在头条推出后，我也受到了重庆市作协的诸多关注。

刘阳主编性情豪爽的红拂女，快人快语，手起刀落；而欧阳斌副主编则像温文尔雅、风流倜傥的宁采臣。这两个人配合如太极之道，多有精彩。我后来回到重庆日报做文化记者，多次采访过他俩。

熟悉之后，有一次刘阳主编邀请我去她家吃饭，还请了几个文艺圈的花样姐姐，她们坐在沙发上就给人一种开沙龙的气派。天上地下，似乎什么都能谈，但我云里雾里，虽然欢喜但啥也没听明白，哎，我太拘谨了，就觉得这种氛围在契诃夫的小说里见过，特别不真实，又特别真实。

我最喜欢的小说《隋唐演义》里曾有一句话，“恩到深处便是家。”《红岩》，于我即是如此。经常去红岩杂志社串门后，两位主编也让我推荐一下身边的新人，他们要做一个重庆文学方阵，诗歌、散文、小说，都要各有方阵。我也积极地张罗着。其实像我这样受惠于《红岩》的小说作者并不少，主编的办公室亦常向文学敞开，欢迎大家去喝茶。宋尾、贺斌、张妮、邓伟、熊辉、张远伦、姚南等，都在刘阳主编的办公室喝过茶。

三年前我换了工作，到红岩杂志社做编辑，浩瀚的小说、散文稿件，鱼龙混杂，良莠不齐，令我感慨良多。每次我思考着如何给作者回信，如何给重点作家约稿，就想起当年自己盲投的那些时光。

现在文学生态环境越来越好，各种奖项、盛会都给了作者们极好的风力。回想过去的老编辑，我觉得自己应该更认真、更体贴，更要和作者们交朋友。

文学似乎是一件越来越小众的事，但小众也是众，它总有一片适宜的土壤。作为重庆唯一一本纯文学刊物，坚守立场很有必要。

坚持，可能会慢，但不会跑偏，就像托尔斯泰在晚年日记中写的那样——所谓爱，就是在一切现象中去认识自己。